

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

丛书主编：黄 济

四书解读

于建福 主 编

传承文脉 开智养正

上起尧舜，下至民初，将中华五千年的主要文化经典呈现在你眼前。丛书一改过去选文缺“经”“子”，选诗少“辞”“曲”等问题。书置案头、床边，口诵、心惟，开大智慧、养浩然气。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四书解读

于建福 主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书解读 / 于建福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1.12

(中华文化经典导读)

ISBN 978-7-5499-0946-9

I. ①四… II. ①于… III. ①四书—青年读物②四书—
少年读物 IV. ①B22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4205 号

中华文化经典导读

书 名 四书解读

作 者 于建福

责任编辑 王家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马鞍山分厂 (电话:0555-8283811)

厂 址 马鞍山市花山工业园银杏大道500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380000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0946-9

定 价 48.00元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837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何以有这样一套丛书

编这样一套丛书的想法，实在由来已久。

作为今天的中国人、炎黄子孙，必修、必诵、应知、应藏的典籍究竟是哪些？学界一直有人在探求。庄严一些讲，近代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梁任公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后人评说这些内容或太繁、或太史；轻松一点说，当代有蒋庆先生独尊儒术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其他以不同标准选材的读本也是林林总总，对青少年来说，却多不成体系，散见于各种素材中，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一种好的做法。为此，站在今天的研究成果上科学传承，负责任、有良心，正是编这样一套丛书的初衷和底线。

丛书得以问世，缘于三年前结识了黄济先生。

黄济先生已过耄耋之年，长期从事教育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其《教育哲学》《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教育哲学通论》等著作被认为是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哲学重建时期的标志性著作。先生幼年曾读过八九年私塾，此后对古代典籍更是不渝地钟爱与研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可谓积淀深厚，观点鲜明，见解深刻。在这般高寿时有这般造诣倒不称奇，奇就奇在黄先生始终公允、辩证、不执迷、不盲从。先生有一座右铭“自以为非”，凡事既反思自己不要自以为是，又思辨为先，不迷信神圣。在成书之间，我们也接触过不少“业内专家”，或但讲“礼崩乐坏，文化救中国”，忧忧中太过悲悯；或但讲“直面经典，不

求甚解，但求背诵，终身受益”，孜孜里何其囿囿。这就让人一下敬而远之了，所谓道不同难相为谋。

这套丛书不因“礼崩乐坏”而编，亦不求“通篇背下、慢慢反刍”，只求成为一中国人景仰、学习中国文化的必备读本，随手翻翻，时时记诵，毕竟这些是传统文化中极优秀的章节篇目。无所谓教材已选，无所谓市面常见。一套相对完整、系统的丛书，家中、手边常备，只为了八个字的宗旨——传承文脉，开智养正。

这套丛书的由来，是教育的，不是教义的；中华文化的传承，必执着之，莫执迷之——目中见，口中言，更需心中醒，身上行。

从策划到成书的几个年头中，黄先生像个小学生一样欢悦地求知和笔耕，与我们这些晚辈平等地探讨，亲切地交流。在先生的引领和感召下，不论是身兼数职的中年学者，还是八零后的时尚青年，无不诚心投入。丛书即将面世的时候，我们感动地对黄先生说：“谢谢您带领我们做这件有功德的事。”他却诚挚地说：“是我要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和帮助，在望九之年还能够重新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至善斯言，至诚吾师。

愿这样一种至善的学习，这样一份至诚的追求，能够对读者有所助益。

曹 华

（中国教育学刊副主编）



分享快乐的事

翻开这套丛书的《蒙学新读》分册，会发现插图的笔触稚嫩、构思可爱，那是我们学校三年级孩子的杰作。主编们策划和编写这样一套中华文化丛书的与众不同之处，从其中一个分册的插图绘制思路中，可见一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全世界推崇，听多了“博大精深”，仿佛这文化与我们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而它与我们的生活却这样息息相关。在外婆讲的俗语里，在孩童背的诗句里；在学习习惯的养成里，在待人接物的原则里；在事业规划的运筹里，在家庭幸福的秘诀里……其实我们已接触了很多、体会了很多。

中华文化的传承，被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多了“紧迫危急”，仿佛这传承是一种沉重的责任，而它与我们的教育却这样默默相契。从一个汉字的来源，从一副对联的巧思，从一条兵法的妙用……其中的智慧、其中的真、其中的大义、其中的善、其中的丰富、其中的美，其实已带给我们太多的快乐和收获。

在我们的学校里，一直提倡“生活国学”、“幸福国学”，就是让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们，在课里课外、在校内校外，喜爱中华文化、浸润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涵养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的成长。

中华文化在生活中居于这样重要又这样亲切的地位，我们也曾困惑，该如何来选、如何来学，才可以不失其精髓，不流于形式，又不陷于枯燥。一直期待，有教育界的专家，以教育者的视角，给出引领与指导。

通过中国教育学会的一次中华文化课题年会，结识了我所倾慕的教育家黄济先生，知道了有这样一套丛书正在编写，这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

在黄济先生整理提纲的基础上，他的弟子们各尽所长，为我们的孩子们，也为我们这些需要传统文化滋养的成年人，选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核心思想、经典篇目。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这样一套必读的传统文化基础篇目相伴，会有特别的踏实与充实。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教育专家，如北京师范大学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教授、博导，石中英老师、檀传宝老师、丛立新老师、于建福老师等等，能够抽出时间、倾注心血，用他们尊重和理解中华文化的眼光，用他们真心喜爱及从中受益的体会，奉献这样一套丛书，这是文化的盛事，亦是教育的盛事。

就从此刻开始吧，让我们分享这样一件快乐的事，与我们的学生，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朋友，与我们自己的人生。

钟 樱

（成都市金沙小学校长）

导 论

《四书》——国人必读的传世经典

《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儒家经典著作。其中保存了儒家圣贤先哲的丰富思想和智慧，是中华文化思想库中的瑰宝，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是中国人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能不读的传世经典。

一、《四书》的由来

《四书》是由《论语》和《孟子》这两本书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合辑而成的。

在《四书》之中，《论语》早在西汉中期张禹(?—前5年)向太子传习之后，其地位就显赫起来。从汉代起，《论语》即被列为“七经”之一。至于“七经”为何，说法不一。全祖望(1705—1755年)认为：“‘七经’者，盖‘六经’之外加《论语》，东汉则加《孝经》而去《乐》。”(《经史问答》)《后汉书·张纯传》注将《论语》与《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为“七经”。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以隶书将《易》、鲁《诗》、小夏侯《尚书》《仪礼》《公羊》、鲁《论语》六经镌刻于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论语》名列其中。到唐代，《论语》即被列为“九经”之一。陆德明(约550—630年)《经典释文》中将《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孝经》《论语》列为“九经”。明代周应宾(?—1626年)在《九经考异》中认为，“九经”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清代惠栋(1697—1758年)在

《九经古义》中也将《论语》列为“九经”之一。据《宋史·百官志上》记载，南朝宋时，设国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经”，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各为一经，《论语》与《孝经》合为一经。唐文宗开成年间，立“十二经”刻石，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到南宋绍熙年间，又将《孟子》列入经部，《论语》仍为“十三经”之一。可见，《论语》被尊为经书，其时间较早，并一直受到重视。

《孟子》学术地位的尊崇始于汉代孝文皇帝置《孟子》博士。据东汉赵岐(约110—201年)《孟子题辞》：“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唐代韩愈(768—824年)认为：“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从道统论的角度确立了《孟子》的重要地位。《孟子》作为儒家经典地位的真正确立始于南宋。南宋孝宗时，朱熹(1130—1200年)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并撰《四书集注》。《孟子》于南宋绍熙年间被列入经部，成为“十三经”之一。两宋之际，尊孟与贬孟之争持续不断，朱熹为此而作《读余隐之尊孟辨》，确信：“《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

《大学》和《中庸》原来分别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最初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唐代韩愈、李翱(772—841年)最早推崇《大学》《中庸》，并将其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其中所蕴涵的思想及其价值才日益凸现。

《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行，最早得益于程颢(1032—1086年)和程颐(1033—1107年)的“表章”。二程视《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大学》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四书集注》)《宋史·道学传》序论中提到：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庸)，下至初学入德之门(学)，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还称程颐“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



达于《六经》。”

四书并行,最终成于朱熹。朱熹深受二程影响,竭力推崇《大学》和《中庸》。朱熹认为,《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的规模”(《朱子语类》卷十四),但认为《大学》有“简编散脱”之处,故对其章次作了重新编定,并“窃附己意,补其阙略”(《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特别补写“格物致知”一章,共 134 字。朱熹同时认为,《中庸》一书是“提挈纲维,开示蕴奥”之作,为“前圣之书”所不及;还将《尚书》中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6 字来阐发《中庸》的“传授心法”。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 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成一套经书首次刊印问世。朱熹花费了四十多年的时间,七易其稿,着重就《四书》作义理阐释,终成《四书集注》。

二、《四书》的地位和价值

《四书》作为儒家经书,不仅蕴涵着儒家丰富的思想与智慧,而且体现着早期儒学形成的嬗变与传递轨迹,反映着儒家的传承关系。一般认为,孔子传曾子,曾子作《大学》;曾子传子思,子思作《中庸》;子思的弟子传孟子,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记孟子的言行,作《孟子》7 篇(每篇分上下两部)。南宋王应麟(1223—1296 年)所作《三字经》对《四书》逐一解说:“《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这可以作为对《四书》最概括的说明。由于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所以《四书》也称为《四子书》又称《四子》。

《四书》问世之后,就与《五经》相提并论,统称“四书五经”。《五经》是孔子之前“古圣先贤”的“先王之教”,《四书》作为儒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许多思想源自《五经》,是对《五经》相关思想的直接阐发。作为进学的程序,可先读《四书》,后读《五经》。由于《四书》比较集中地

论述了为学修己、待人处世、治国理政之道，阅读起来相对容易，便成为初级教育阶段的必读教材；《五经》内容宽泛，成书久远，阅读起来比较困难，便成为较高教育阶段的必读教材。在朱熹看来，“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四书语类》卷一百零四）《四书》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人生初级教育的读本，是有客观缘由的。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前人学说，又有其独特见解，并切于世用，加之以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去世后，“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宋史·道学传》），即将朱熹《四书集注》审定为官书，并从此盛行起来，《四书》逐步取得了与《五经》并列甚至优先的地位。元世祖至元年间规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元史》卷八十一）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考试，首场试题主要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元史》卷八十一）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四书集注》中。由于这些因素，《四书》从结集成书到清末近八百年间，成为名副其实的儒学经典，《四书集注》也成为士子们登科及第不可或缺的标准教材。《四书》无论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人格涵养，伦理道德修养，还是对丰富人生，增进智慧，成就事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并不为过。

三、《四书》的研读

1. 讲究《四书》研读次第。

古人历来讲求读书次第，读《四书》也是如此。就道统次第或谱系次序而言，《四书》的排列顺序应该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但



就道学次第而言，朱熹特别强调《大学》纲领性地位，其次序应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朱熹认为：“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第十四）朱熹主张：“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晚年发现，《大学》之意，学者不易领会，于是提出可先从《论语》《孟子》入手。据此，本书建议：先读《论语》，感悟孔子之道，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深悟孔孟之道；再读《大学》，以定其规模，立定纲领；后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如此读来，未必影响《大学》对《四书》的统领。

至于《四书》和《五经》研读的次第，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论语孟子法》）朱熹认为：“《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在朱熹看来，“《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子语类》卷十四）尽管从《四书》和《五经》成书先后来分，是“经”在前，“书”在后，但从宋以后，一般是先读《四书》，后读《五经》，正如《三字经》中所言及：“《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2. 对《四书》经典存敬畏之心。

“经典”是指那些能够穿越时空，给一代代人带来心灵震撼和滋养的杰作。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和价值的载体，没有经典的民族往往是没有精神和价值支撑和文化身份的民族；经典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所，经典若被焚毁、否定或忘却，借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价值就没有了基础，也就难有文化认同，这样的民族就成了灵魂漂泊、精神恍惚的民族，就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经典不仅能提供知识，而且能发掘潜能，启迪智慧，丰富人格，滋养人生，消



除颓废,超越平庸。故应多诵读传统经典,善于吸收其精华。当然,对同样一部经典,诵读者会见仁见智,各有取舍。

中华文化经典就是中华文化精神价值的载体,是重新确立中国人文化认同之根,培养中国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之本。要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认同,就必须从诵读经典做起,尽早恢复经典的教育地位。如果说西方人必读的一本书是《圣经》,那么中国人必读的一部书应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瑰宝——《四书》。孔子说:君子“畏圣人之言”,小人“侮圣人之言”。《四书》本身载有“圣人之言”,现代人对《四书》这部充满人文精神、人本理念和人生智慧的经典名著,理应心存敬畏而不是轻侮,勉力学习和领会,坚持数年,必然大有裨益,必能终生受益。

3. 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把握其“一贯之道”,避免断章取义。

《四书》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四子”的思想特征,在研读过程中,很有必要把《四书》的思想体系化,准确把握其“一贯之道”,领会其精神实质。《四书》的读法,须“得于辞而通其意”,可以一章一章地研读,一字一句地感悟;同时要善于将散见于各章中的对同一问题或相关问题的论述联系起来,融会贯通。

理解和诠释原典,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朱熹强调:“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答石子重》)圣人之“意”主要存在于经典之“言”中,学者可根据“先达之言”领悟“圣人之意”,再根据“圣人之意”求得“天地之理”。“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书中庸后》)朱熹相信:“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经典的文字是理解“圣人之意”的关键和依托。就《四书》而言,学者首先应结合历代学者对《四书》每部经典的训诂传注,深刻理解经典中的字义文义、句义章旨,在此基础上推究圣人之“本意”,感悟其中的精微,进而探求《四书》之中蕴涵着的“天地之理”,领悟其中的道理和奥妙。



4. 读其书当论其世而知其为人。

司马迁(前 145—前 89 年)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艰难曲折而不平凡的人生阅历,就是后人感悟人生的鲜活教材。孔子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给后人以深深感染。郁达夫(1895—1945 年)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我们应该懂得如何善待他们。读《四书》,会大致了解孔子、曾参、子思、孟子的为人,感悟其人生,仰慕其人格,汲取其智慧。而全面了解孔子、曾参、子思、孟子的为人,包括人生阅历,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人生智慧,必将有助于加深理解《四书》之精髓。

5. 吸取其精华,无求备于一书一人。

《四书》中许多话都成为格言流传于后世。读《四书》要着重吸取其有普遍意义的精华,有益于自身的人格修养和文化素质,激发自身的道德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四书》思想的时代价值,汲取其中蕴含的智慧,以有益于教育和管理。要以世论人,正确看待其历史功绩,在判断其历史功绩时,主要看其比前人超出了什么。“四子”各有超出前人之处,又有可供我们学习、吸收的人生智慧和育人智慧,对这样的伟大人物我们就更应倍加珍惜和敬重。“四子”是人不是神,身处 2000 年前的宗法等级制社会中,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四书》的内容也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今天研究“四子”和《四书》,必须置于“四子”所生活的时代,“不求备于一人”;置于《四书》的成书时代,不求全责备于一书,重在吸收《四书》精华,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予以发扬光大。

总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更是做人立身处事之经典读本。身为龙的传人,不得不潜心研读,感悟圣贤人格,领悟圣贤教诲,启迪智慧人

生,身体而力行。

四、本书编撰说明

本书在丛书主编黄济老师悉心指导下,于建福负责全书的统筹统稿,并与武薇、朱学芳、廖惠芳合作完成。早在2006年,研读小组做了初步分工:于建福负责《论语》选读;廖惠芳负责《孟子》选读;武薇负责《大学》选读;朱学芳负责《中庸》选读。三位研究生在研读经典的基础上,陆续提交了各自的选篇和解读,并在《高校教育管理》“经典研读”栏目分别发表了研读论文。这对“80后”年轻学者而言,实属不易。由于计划的调整和三位研究生学业(武薇在读博士生)及就业(朱学芳、廖惠芳分别就业于北京和广东)的变动,在提交初稿后的大量统筹、审校、扩充、完善工作则由于建福来完成。征得黄济老师同意,《孟子》增加了大量篇幅,和《论语》一样仍分别按主题选编,并按逻辑关系作了编排,选文尽可能保持章节的完整性,以免有断章取义之嫌;为便于阅读,也为保持系统和连贯,《大学》和《中庸》按原典全文收入;为每一部书加了标题,即:《论语》——修己安人之圣教,《孟子》——崇善施仁之睿智,《大学》——明德新民之善道,《中庸》——中和位育之哲理;为全书撰有“导论”,为每一部经典加了概说性的“引言”,具体介绍该部经典的概况,力图为读者提供必备的知识背景和研读提示;正文均为读者精心设计了“标题”——“题解”——“原文”——“注释”——“译文”的研读路径。“标题”力求精准,词句尽可能出自“原文”;“题解”力求紧扣主题,诠释文意,适当参以本人一得之见,努力挖掘其中包涵的文化意蕴及教育价值;“原文”主要参考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原典,《论语》和《孟子》所选每一章句之后均注明出处;“注释”则取众家之长,遇有异说,择善而从,尽量简约,浅显易懂,个别字加有注音;“译文”力求信、雅、达,尽可能反映原意,雅致耐读,自然流畅。为便于查询,全书附有出现过的人物名录,而且行文中首次出现历史人物时均尽可能注明生卒年份。本卷



在选编撰写过程中,参阅和借鉴了古今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主要成果均以“主要参考文献”形式于书末列出。统筹、改动、调整、变化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当由本卷主编承担责任。

历时五载,以事务繁杂,尤以经典认知本身的难度,致使“解读”时断时续。因我深知,经典“解读”绝非轻而易举,首要的是,“解读”者自身需要对经典和先贤抱以起码的温情与敬意,这对我而言似乎不成问题。难题在于:要将经典解释清楚,自己首先需要精心研读,务求真理解原义,若“以其昏昏”,则难以“使人昭昭”;成功的经典“解读”必“作于细”且讲信度,字义句读逐一核实是必须花费的起码功夫,即便如此,也难免漏洞百出,何况经典释义本来就是见仁见智;有价值的经典“解读”必研发其精微,体味其玄妙,探究其奥义,把握其一贯之道。有见于此,数年研读不辍,寝食思之,寤寐念之,考释检索,虽学有寸进,然举步维艰,终难言成。眼见“协议”逾期,口头承诺一再食言,尤其错过了藉以为老师九十寿辰之贺礼。敢向老师和关注本书的友人解释的是,始终未敢懈怠,也没找理由搁置,更无欲举而弃之。幸好近期难得“休闲”,实得“塞翁”之福,得做自己想做且能做之事,于是夜以继日,甚或通宵达旦,终成目前格局。无论如何,我决计明天要呈老师审读了。

开卷必有益。孔子云:“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谋。”(孙星衍《孔子集语》)诵读《四书》,往来于孔曾思孟之间,穿梭于古往今来之际,所享之益,实难尽述。本书力求兼顾初学者和研读者之需,似可为初学者提供入门之径,或可为研究者提供精进之路。循此以求,自卑自迹,或能终至高远;得其门而入,当能登堂,甚或入于室。吾愿与君共勉之!

于建福

庚寅十月二十六日子夜



◎ 导 论 / 1

◎ 《论语》解读 / 1

引言：《论语》——修己安人之圣教 / 3

一、性近习远 学而不厌 / 14

性相近 习相远 / 14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 15

学而知之 / 15

好古 敏以求之 / 16

学而时习之 / 17

学而不思则罔 / 18

思而不学无益 / 18

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 / 19

入太庙每事问 / 20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 21

以能问于不能 / 22

学无常师 / 23

不好学之六蔽 / 24